

##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摘要

Huang, Jing. (2000).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以下摘要节选翻译自原书的扉页和引言。

---

派系主义 (Factionalism) 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精英成员之间的清洗和内讧 (purges and infighting), 1949年后, 党内还出现了看似非理性的、经常是恶性的领导权继承斗争。除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外,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几乎所有继任者, 包括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 都遭到了清洗。人们不甚了解的是, 1949年后政治权力和合法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党的团结 (Party unity) ——是如何与这一分裂特征共存的。对于派系政治与政策结果之间的确切关系, 学者们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本书中, Jing Huang 研究了派系主义在领导关系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他对党内政治的详细了解使我们对中南海领导层幕后长期争议的斗争有了新的认识。

Huang 追溯了派系政治的发展历程, 从共产党革命时期由游击队领导人领导的各种“山头”或权力基地开始, 并描述了毛泽东与其支持者在延安的圆桌会议上形成的个人纽带的持久影响。他解释了派别纷争如何导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以及邓小平如何操纵派别纷争来策划他的上台。

Huang 认为, 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性质——包括政治竞争者与其支持者之间高度个性化的关系、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程序以及不确定的决策规则——使得派

系主义盛行。Huang 的分析表明，派系活动并非如有关领导关系和决策制定的主流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权力斗争导致的；是派系主义将权力变成了中共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因此，派系活动是造成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政策结果在“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之间不断转换；在邓小平时代，政策结果在“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不断转换。然而，Huang 断言，矛盾的是，派别主义并不一定是不稳定和混乱的。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 领导关系和决策中的派系主义

派系主义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非正式团体在其上级组织中争夺主导地位的政治，是中国政治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除了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派系活动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关注这一主题：……

然而，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派系斗争的研究仍显不足。很少有人对派系主义在中共政治中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很难想象倾向于分裂党的派系如何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一直誓言消除党内的派系活动，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党的团结对其统治至关重要。更为实际的是，如果派系主义构成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动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将真正的政策争议与无原则的派系冲突区分开来呢？或者，正如有些人所说，如果两者纠缠在一起，派系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结果，反之亦然？此外，派系主义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整体政治发展？总之，派系主义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谜题，而非答案。正如 Kenneth Lieberthal 和 Michael Oksenberg 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关于派系主义）能像这些问题一样让中

国政治的外部观察者如此着迷，但也很少有能像这些问题一样具有如此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派系主义已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但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主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时最棘手的问题：领导关系和领导决策。自 1921 年中共建政以来，领导层关系就一直变幻莫测，肃反运动频繁，1949 年后的接班人之争更是恶性循环。除了 1989 年 5 月危机后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外，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所有继任者都遭到了清洗。此外，除了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被邓小平赶下台之外，其他继任者均被毛泽东和邓小平推翻。中国领导层的决策也让我们感到困惑，这不一定是因为它的秘密性，而是因为它的非一致性。毛泽东时期的政策结果在“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之间不断转换，邓小平时期的政策结果在“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不断转换。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和十五不一样”。

本书旨在从派性的角度解释领导关系和决策，其目的在于说明派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领导关系的变化和政策结果。

## **领导关系和决策中派系主义的西方分析**

第一章探讨了西方对中国领导关系和决策的分析的演变。这些解释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政策选择模式、结构模式和权力斗争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强调派系活动，但其解释却大相径庭。

政策选择分析的学者认为，领导关系是由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选择决定的。这些领导人对现有问题的不同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派系活动(如果有的话)

在政策对抗中出现，在对抗中，观点相同的人联手使自己的选择占上风。Harry Harding 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分为两类。较为保守的领导人对大幅偏离苏联模式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国有工业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持谨慎和怀疑态度。与此相反，激进的改革者则采取更大胆、更冒险的措施，将中国推向市场经济、新的公有制形式和更多元化的政治秩序。”

根据官僚政治理论，结构分析学者认为，领导关系反映了领导人在决策结构中的地位，而他们的制度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政策选择。派系活动的本质是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权力体系的分割和分层”，官僚互动与派系活动交织在一起，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Lieberthal 和 Oksenberg 指出，“石油派”的所有重要成员都是从石油行业掌权的。

权力斗争分析学者认为，领导关系是由精英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的，领导层的决策基本上反映了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者的愿景。正如 Lucian Pye 所说，“干部派系的首要基础是寻求职业安全和保护权力”。中国派系的力量在于个人的关系，他们在等级森严的环境中运作，建立起向上延伸的联系网络，以支持特定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反过来又在寻找追随者，以确保自己的权力。

然而，这三种模式的解释都基于一个有问题的假设，即派系主义是一个因变量，是政策争议、机构利益冲突或权力斗争的结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具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总是和睦相处。刘少奇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支持毛泽东制定政策，但他拼命追赶毛泽东的步伐并没有阻止毛泽东对他进行无情的清洗。尽管林彪的“态度确实是‘毛主席说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事实上，有着共同政策倾向的中共领导人往往有着不同的派系结盟：四人帮和林彪都支持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是林彪

最终倒台的根本原因；陈云和彭真在邓小平时期都以保守著称，但陈云在阻止彭真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但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倒台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机构利益冲突可能构成政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动态，但如果“无法准确衡量任何特定官员群体的真正权威”，就很难解释最终的政策结果。此外，如果将不同机构“联系在一起”并“构成整合系统并使其运作的最重要因素”的不是制度安排，而是个人联系或称“关系” (*guanxi*)，那么我们又如何界定机构利益呢？领导者努力促进其办公室的利益，主要是因为该办公室已与他的关系网紧密相连，其福祉对其派系的实力有重大影响。因此，领导人的权力与其说是由其官职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通过其关系网络所获得的支持决定的。例如，尽管邓小平和陈云在 1989 年后就不再担任官方职务，但他们在 1997 年和 1995 年去世前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权力斗争模式或许为中共政治中的派系斗争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它的分析引出了更深刻的问题。如果领导人的权力来自其派系网络，而非其机构或对其政策选择的支持，那么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团结是必要的前提条件，那么他如何发展和控制这些网络？他如何调整自己派别的利益，使之与他主持决策的机构的利益相一致？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认为派系主义是中共政治中形成领导关系和领导决策的一个自变量。**具体而言，领导人的权力基于其派系网络的力量；他与同僚的关系与其说是由他们对其政策选择的利弊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们在等级背景下与他的权力互动的后果决定的；决策是根据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人的愿景做出的，而不是通过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偏好的正当程序做出的。我的分析轴心

——派系主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似乎与权力斗争模式一致。但必须明确指出两者的根本区别：权力斗争不会导致派系活动；相反，正是派系主义将权力变成了中共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在中共政治中，权力高度个人化，政治过程的制度化不足，决策的程序和规则也不确定。

## 中国共产党政治中派系主义发展的条件

假设派系主义是领导关系和决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自变量，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问题：尽管中共领导层一再谴责并誓言消除政治事务中的派系主义，但派系主义为何会在中共政治中发展并盛行？第 2 章从中共体制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中共体制中，(1) 权力被赋予等级森严的领导人个人，(2) 党垄断了表达不同利益的所有合法渠道，(3) 从未真正采用正式的决策程序，(4) 军方经常干预政治事务。派系主义是中共政治与生俱来的，因为这四个特点为派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中共以毛泽东“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行革命。因此，中共的力量是由不同领导人在各自的根据地分别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根据地是相互隔离的。在战争的险恶形势下，这些领导人在决策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根据自己部队的实力，更重要的是根据下属的忠诚程度，将权力委托给下属。这种个人委托权力的模式促进了领导人与其追随者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即“关系”，前者需要后者的支持，而后者在政治事务中也需要前者的保护。这些关系创造了“老友网络”（old-boy networks），为派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正是一党执政将普遍存在的老友网络变成了政治派别。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垄断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表达的所有合法渠道。但这些利益很少是和谐

的，因为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社会利益最终会在党内找到表达方式。”然而，当分歧出现时，中共领导人不能将其公之于众，因为党的团结形象对党的统治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中共领导层出现分歧时，肃反运动就会随之而来，而受害者总是被指责为“阴谋分裂党”。因此，相关领导人不得不通过非正式渠道——老友网络——寻求支持，以解决分歧。我的研究表明，在中共政治中，关系网络的功能是：

(1) 政治同僚之间的专属沟通渠道；(2) 其特定利益的出口；(3) 其势力的指挥系统——这些功能在多元政治体制中通常由政治组织承担。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个人关系的反复滥用使普遍存在的老友网络变成了政治派别。

要解决一党专政与多元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将决策过程制度化，即通过制度安排建立一个正式的过程，在决策过程中遵守正式的规则、合规的程序和标准的操作惯例。在保持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为政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多元渠道；合规的程序可以在决策中优先于个人关系；标准的操作惯例可以使个人在政治事务中难以滥用权力。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制度而非领导个人的权威。

但在中国，政治进程的制度化尚未实现。权力始终集中在个别领导人手中。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保持他们的指挥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就有特权违反任何既定的决策规则和程序。因此，决策过程中的所有正式安排都成了幌子，而在幌子之下，与强势领导人的关系网成为实现预期政策目标不可或缺的因素。政治事务中对关系网络的依赖助长了派系活动。

缺乏正式程序的另一个主要后果是，正如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当决

策者的偏好是不可传递的 (intransitive) ——也就是说，当他们之间存在种类差异时，政策程序必然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政策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并确保制度的运行，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即毛泽东或邓小平，不得不诉诸军事干预来执行他的选择，这在中共历史上屡屡发生。鉴于中共的大部分派系都源自战争时期的武装力量，反复的军事干预不仅巩固了主导领导人的权力，也加强了他们的派系结盟。因此，军队已成为中共政治中最重要权力基础。没有军队的支持，党的领导人无论看起来多么有影响力，都无法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时期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时期的陈云就是典型的例子。

## 毛泽东掌控下的山头 and 领导关系

派性在毛泽东指挥权的建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由许多山头造成的。山头 (mountaintops / *shantou*)，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通常发展在革命时期最适合开展游击战的山区。由于这些根据地相互隔绝，而且这些地区的中共部队必须独立作战，因此领导人与其部队之间以及来自同一山头的干部和军官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个人联系。这些个人纽带构成了中共派系的基础。因此，“山头”成了政治派别的代名词，而“山头主义”则是中共行话中的派别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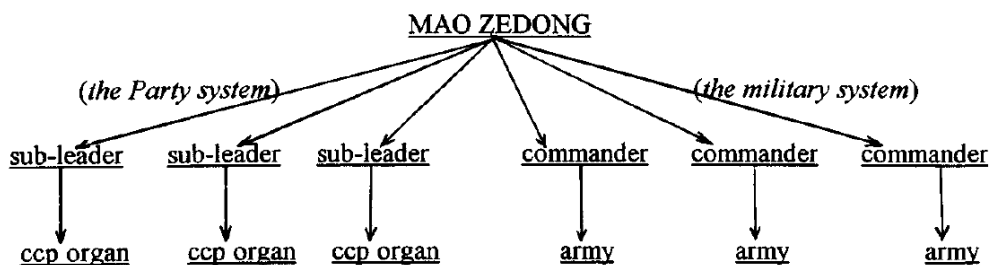


Figure I.1. The structure of the Yan'an Round Table (solid arrow = direction of control based on personal loyalty)

第 3 章探讨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张国焘领导的军队和王明领导的党内反山头斗争中取得胜利后，如何将所有山头置于延安圆桌（即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之下。更重要的是，在 1937-1945 年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共的“指导原则”。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而且使毛泽东的指挥权不可挑战，因为任何对其指挥权的挑战最终都会破坏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但延安圆桌会议的结构派系林立。如图 I.1 所示，毛泽东基于个人忠诚而非制度安排的权威确保了领导关系的稳定。毛泽东的指挥权得到了党和军队系统高层的支持，而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这两个系统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只有毛泽东才能同时掌控这两个系统。将领们的忠诚使毛泽东得以确保其在党内的霸权地位，而“党指挥枪”的原则则为毛泽东指挥军队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延安圆桌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领导层，使其革命得以在各个山头开展。它不仅体现了山头领导人之间的同志情谊和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还为中共政治中的派系主义设置了一个结构性枷锁。在这种领导关系结构中，试图扩大权力基础的副领导人不得不与其他领导人进行零和斗争，而他的扩张也可能面临毛泽东的镇压，因为这对他的指挥构成了潜在威胁。确切地说，延安圆桌会议一方面将最高权力交托给毛泽东，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同志中建立了一个制衡体系，从而确保了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的稳定。只要毛泽东愿意，就可以维持现状，因为除了毛泽东——这位完全控制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其毛泽东思想为这种领导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没有人能够施加外力打破领导层的稳定。

但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问题在 1949 年后很快就暴露出来。国民党垮台后，

中共势力迅速扩张，中国几乎被中共各山头瓜分殆尽，其领导人成为其势力控制区的“国王”。为了防止“独立王国”并削弱刘少奇的势力，毛泽东将所有山头领导人都调到了北京。中央集权的努力导致了中共领导人之间权力的全面重新分配。这打破了延安圆桌会议的稳定。

第4章重点讨论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重大精英冲突——1954年的“高饶事件”，以说明1949年后延安圆桌会议的重大转变。高饶事件并不像传统解释所认为的那样，是高对毛和其他领导人意图的“误解”和“误判”：

- 1、事件的起因是党内以高、刘为首的两大山头在中央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 2、是毛泽东怂恿高向刘发难，以削弱刘的山头地位。但正在进行的权力再分配使整个事件更具爆炸性，因此毛泽东也更难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进行周旋。

- 3、毛泽东最终放弃了高，因为高明目张胆地干预人事，尤其是在军队领导人中肆无忌惮地游说，对毛泽东的指挥构成了直接威胁。

事实上，毛泽东对高岗的“背刺”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指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毛泽东是中共领导层中唯一一个被允许同时控制党和军队系统的人。正如我的研究反复表明的那样，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在不属于他的系统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与高饶的倒台一样，1959年对彭德怀和1971年对林彪的清洗、1973-1975年对周恩来的“遏制”以及1976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倒台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都倾向于或已经在他们本不应领导的系统中发展了实质性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暴露了延安圆桌会议的两个结构性缺陷。首先，虽然每个领导人都按等级对毛泽东负责，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次级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几乎没有制度安排。所有形式的控制——信息、指令、建议、报告、投诉

——都必须直接流向毛泽东或从毛泽东那里流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对毛泽东的指挥权非常重要：它在确保毛泽东直接控制每个分管领导的同时，也将分管领导之间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因为这种联盟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指挥权。然而，这一特点也给毛泽东造成了两难境地，尤其是在 1949 年之后：尽管毛泽东必须让各种控制权直接流向他，以确保其指挥权，但要他密切关注每一个政策问题，对他来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因此，那些能接触到毛泽东的人要么试图操纵政策进程，如刘少奇在 1951-1953 年所做的那样，要么利用毛泽东的名义为自己谋利，如高在 1954 年的游说活动中所做的那样。

此外，随着中共领导人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他们每天面对的不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各种问题、不同的利益，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政策目标。但制度安排上的缺陷阻碍了他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充分表达观点并有效协调不同的政策目标。这一切导致了政策过程中意想不到的冲突和不稳定。戏剧性的例子包括 1950 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的不一致，20 世纪 50 年代初土地改革政策的不一致，以及 1953 年薄一波税制改革引发的争议，进而引发了“高饶事件”。

第二个结构性缺陷是，最高领导人的最终离任会立即破坏领导关系的稳定，在最高层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进而打破现状，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事实上，早在最高领导人预期离任之前，就可能发生争夺更好职位的竞争。例如，高对刘的攻击主要是出于他想取代刘成为下一任领导人的野心。

中共领导人为克服这两个结构性缺陷所做的努力，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的领导关系和决策制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 双线安排、精英冲突和政策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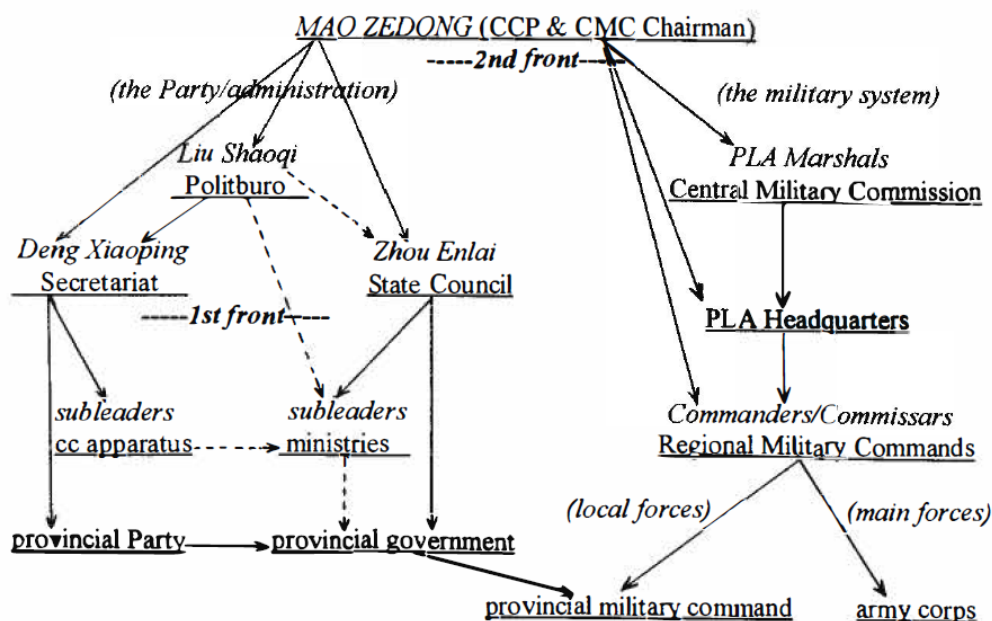


Figure I.2. Two-front arrangement, 1954–1966 (solid arrow = direct control; dashed arrow = indirect control)

第一个结构性缺陷的解决方案是所谓的双线决策安排（图 I.2）。第 5 章探讨了这一在 1956 年第八次党代会上正式确立的安排如何给领导关系和决策带来巨大变化。我的分析得出了以下要点：

1、毛泽东以个人忠诚为基础的指挥与党领导层将政策过程正规化的努力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根据政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重塑领导关系，这构成了精英冲突的根本原因。

2、政策的不一致性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再违反既定的制度安排造成的。

3、毛泽东向党内体制发起冲击——文化大革命——不一定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反官僚主义”或他个人对刘少奇及其同僚的不满，而是因为党内体制体现了一种正式的程序，这种程序赋予了党内官僚以权力，却限制了毛泽东个人在政策

制定中的权威。

将图 I.2 与图 I.1 相比，领导关系结构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文职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分为两条战线：毛泽东留在第二条战线“决定原则问题”，而其他领导人则在第一条战线管理日常政策事务——因此被称为双线安排。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战线的领导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特定的职能。例如，刘少奇掌管政治局，负责监督整个政策制定过程；周恩来负责国务院，这是行政中心；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充当信息枢纽。这些制度安排大大改善了领导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正式的政策制定程序。这一切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至关重要。

双线安排也是为了解决毛泽东在决策方面的困境，同时又不削弱他的指挥权。留在第二战线，毛泽东可以摆脱日常事务的负担，同时仍然保持指挥权，因为他可以直接控制第一战线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制衡制度体现在决策的制度安排中。毛泽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会为他的指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军事系统中没有双线安排，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决策过程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双线安排给领导关系和决策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问题时，一线领导人的评估和诊断并不总是与毛泽东的设想一致。毛泽东可以从“革命原则”的角度来设想问题，而第一线领导人则必须设计出能够满足其政策目标的解决方案。尽管第一线领导人试图保持对毛泽东的忠诚，但他们对所设计的政策目标的责任感将他们的最大利益与客观的政策结果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毛泽东与第一线领导人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分歧时，后者必须团结一致以实现其政策目标，而既定的制度安排使他们能够操纵政策过程而不直接对抗毛泽东。因此，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双线安排削弱而非确保了

他的指挥权，因为它不仅在第一线领导人之间创造了共同利益，而且还体现了对毛泽东权力施加限制的适当决策程序。正如毛泽东在 1970 年向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承认的那样，他不得不让自己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夕产生，以弥补其权力的下降，并“刺激群众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为了说明双线安排如何制约毛泽东的权力，以及他对这一安排的违反如何破坏了政策进程的稳定性，并最终破坏了领导关系，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我们目睹了文革集团之前最剧烈的政策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末，政策从第一次跃进进到“坚决退却”，再到大跃进；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济政策中的务实方针与政治领域日益激进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个时期明显的政策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毛泽东为防止其指挥权受到侵蚀而一再违反两条战线的安排造成的。尽管毛泽东能够向第一战线的领导人推行他的构想，但如果不通过党内官僚控制的既定程序，他就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具体政策。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沮丧和怀疑，他不得不从党外寻求支持，并向整个党的建制发起全面进攻。其结果就是文革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清洗党内精英并不一定意味着毛泽东背叛了他的昔日战友，或者觉得他被昔日战友背叛了。相反，他们之所以必须离开，是因为毛泽东想要摧毁他们所主持的党的机构。因此，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肃清包括彭真在内的刘少奇及其部下是毛泽东的个人意愿，但邓小平和罗瑞卿等领导人基本上是党内机构倒台的受害者。

尽管很少有人会反对“文革的最终责任完全在毛泽东”的说法，但文革为何能最终消灭几乎整个延安圆桌会议——不仅是党内精英，还有军队领导人——他们的支持使毛泽东得以在一开始就发动文革。因此，文革也给毛泽东本人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因为延安圆桌会议正是他指挥的基础。不管毛泽东的目的是什么，

他怎么可能最终毁掉自己的领导基础呢？

第 6 章从文革时期派系主义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党内制度的崩溃解除了中共政治中派系主义的组织枷锁。随之爆发的派系斗争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境地：他需要得到最强大派系的支持以维持其指挥权，但他又不能让这一派系在政治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难题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首先，毛泽东不得不向突出的派别表示恩庇，以换取其支持；但当这一派别在他的庇护下成为主导时，毛泽东又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较弱的派别，以防止主导派别变得过于强大。这一切造成了领导关系的持续不稳定和政策制定的反复无常。

我的研究集中于这一时期领导关系和决策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军队在启动文革集团中的作用、毛林冲突以及邓小平的回归及其影响。我的研究结果与传统的解释有所不同。首先，尽管江青和张春桥等毛派激进分子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集团，是因为得到了所有军事领导人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林彪。其次，毛泽东对军队的依赖迫使他在党垮台后立即爆发的军队高层派系斗争中站队。在毛泽东的庇护下，林彪的山头以牺牲其他山头为代价迅速扩张。这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囚徒困境”（见下一节的讨论）。最后，林彪的倒台使周恩来得以控制党和军队系统，这不一定是因为他在林彪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是因为他是领导层中唯一一个能够接触到这两个系统中派系网络的人。这对毛泽东的指挥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是毛泽东以外的中共领导人第一次能够同时控制党和军队。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请回邓小平来遏制周恩来，因为邓小平能够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在两个系统中都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

但是，邓小平在执行任务时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他必须让“老友”回来，以巩固他的地位并恢复稳定，但这样做实际上会“推翻文革的判决”。邓小平的选择使他与毛泽东主义者，最终与毛泽东本人，发生了致命的冲突。他的第二次倒台是不可避免的，这标志着延安圆桌会议的最终崩溃。

回过头来看，延安圆桌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其派系林立的结构无法适应1949年后政治进程的正规化。正规化是领导层稳定和政策一致性的必要条件，它要求根据领导人在决策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非个人关系来重塑领导层关系。最终，毛泽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使他的指挥权适应正式程序，因为这将对他的个人权威施加限制，就像对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施加限制一样；要么取消这一程序，以保持他的绝对指挥权。毛泽东有意无意地首先尝试了前者，但最终他选择了后者。毛泽东没有意识到的是，背叛他的并不是他以前的同志，而是党的官僚机构赖以建立的正式程序损害了他的权力。毛泽东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打击消除了中共政治体制中对派系主义的组织枷锁，大规模的清洗引发了一连串的派系争权夺利。最终，由于这些派系斗争拖垮了整个延安圆桌会议，毛泽东的指挥变得毫无根据。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变得越来越马基雅维里式，他的个人崇拜在他最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是弥补其指挥基础被侵蚀的唯一方法，他的指挥看似如此绝对，但实际上却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于不能容忍决策中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分歧。

### **“培养接班人”和接班人斗争的恶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一个难题是接班人斗争的恶性循环，本书从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结构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正如我在前面所讨论的，延安圆桌会议的另一结构性缺陷是它很容易因最高领导人的离去而突然崩溃。中共领导层试图

通过在最高领导人仍在位时“培养接班人”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接班人将在最高领导人离任时接掌领导权，因此可以避免因最高领导人去世而引发混乱。

然而，在派系林立的领导结构中，权力的稳定一方面取决于次级领导人之间权力的均衡分配，另一方面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指挥权。为了确保继任者不会受到其他山头领袖的挑战，最高领袖不得不将更多的权力交给继任者，而继任者则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地位。继任者的扩张迟早会打破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危及现状。继任者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感到威胁。此时，领导人有两个选择：继续支持接班人，或遏制接班人以确保自己的指挥权。与此同时，继任者要么停止扩张，要么继续扩张以巩固权力。这种情况正好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模拟，在囚徒困境中，领导者和继任者都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地位都受到了威胁。

但是，领导者和继任者并不是“必须在没有机会明确协调行动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囚犯，他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呢？当问题开始出现时，领导者和继任者之间没有进行沟通，这似乎确实难以想象。然而证据表明，这正是接班人斗争中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在被清洗前对毛泽东的意图“一无所知”，“也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在感觉到邓小平对他不满后，迫切希望“（与邓小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赵紫阳在邓小平倒台前夕拼命想与邓小平“真诚地交换意见”，但他甚至不知道邓小平的下落。

这并不奇怪，因为“囚徒困境”所反映的本质是两个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我的研究表明，引发接班人之争的原因不一定是缺乏沟通，而是领导者和继任者之间的信任受到了侵蚀，因为前者感到了后者日益增长的权力所带来的威胁。领导者怀疑继任者不会停止自己的扩张，而继任者则不相信领导者会在自己不断扩

张的情况下继续庇护自己。鉴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建立在相互忠诚和信任的基础上的——一个人被选为接班人的必要条件就是他必须被领导者视为最值得信任的人——失去信任就意味着这种关系的终结。缺乏信任会阻碍两人寻求“理性”的妥协。因此，接班人之争演变成了一场决斗，在这种决斗中，鉴于全能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容忍性质，除非对手在政治上被消灭，否则两人都不会感到安全。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囚徒困境为毛泽东或邓小平领导人与其继任者刘少奇和林彪或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看似不合理的悲剧性关系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培养接班人”的努力会带来接班人斗争的恶性循环：接班人的上台会导致与其靠山的殊死搏斗。但是，接班人之争本质上是由结构引起的，因为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结构要求领导人提携接班人，这也注定了领导人与其接班人之间的囚徒困境的到来。

## **延续与变化：邓时期的党派之争**

文革时期残酷的派系斗争使中共政治变成了一系列背叛、阴谋和清洗。中共党员之间的同志情谊丧失殆尽，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受到侵蚀，党的凝聚力遭到破坏。因此，虽然党的制度得到了恢复，但它对派别主义的组织枷锁却大打折扣。在后毛泽东时代，派系活动在政治事务中变得十分猖獗。

第7章探讨了邓小平如何在毛泽东逝世后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及派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邓小平时期的政治结果。我的研究表明，邓小平的执政之路其实与毛泽东相似：两位领导人都是通过派系斗争上台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独占了党和军队系统的山头。因此，邓小平时期建立的领导关系结构类似于延安圆桌会议的结构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在这种结

构下，邓小平才能确保其统治地位，并稳定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在这样的结构下，毛泽东时期领导关系和决策中的所有基本问题在邓小平时期再次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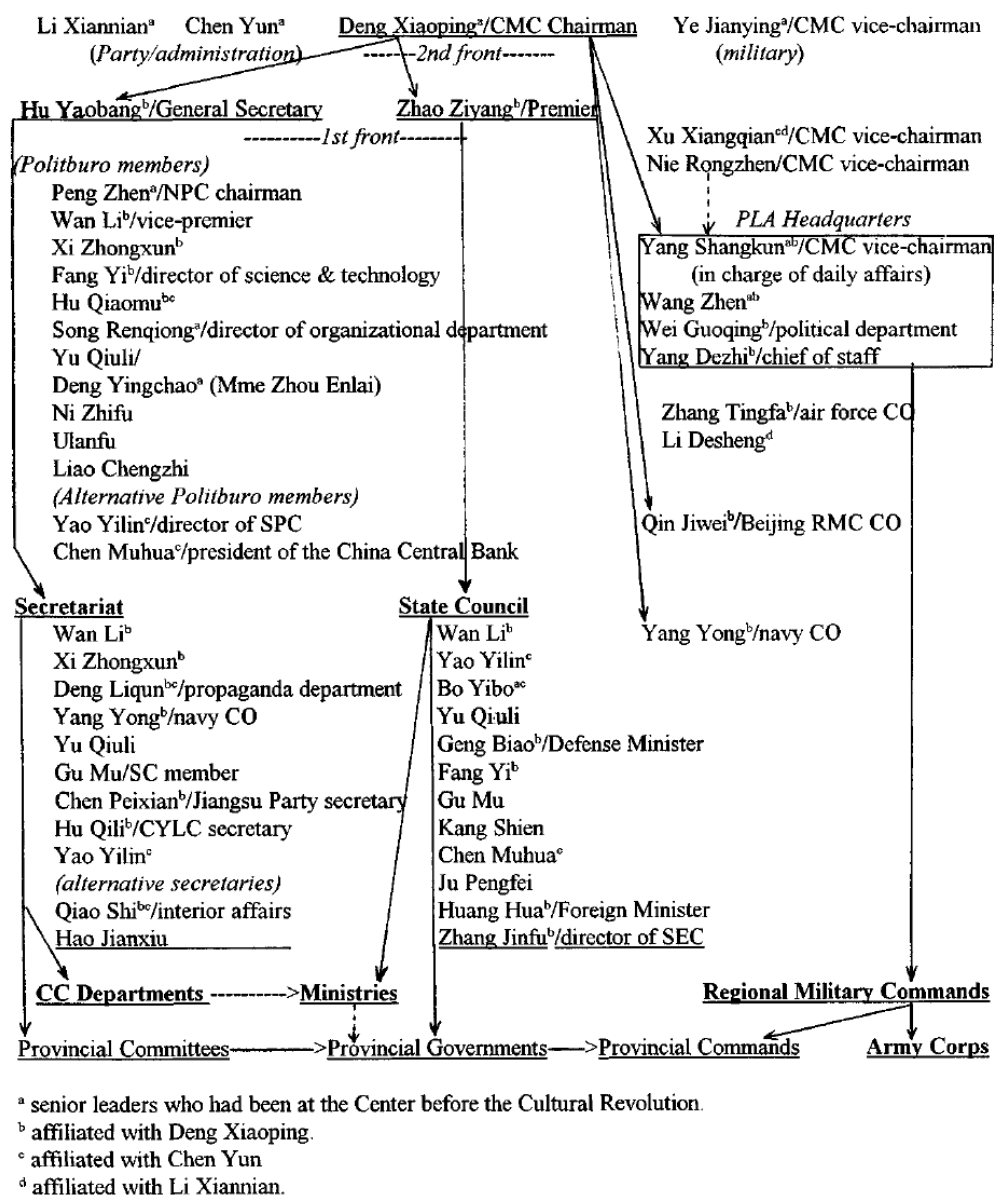


Figure 7.1. Leadership relations under Deng Xiaoping's dominance, 1982 (solid arrow = direct control; dashed arrow = indirect control)

首先，邓小平面临着与毛泽东相同的决策困境，因此他采用了相同的解决方案——双线安排(见图 7.1)——以解决这一困境。这导致了与毛泽东同样的问题：他与一线领导人（即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恶化。毫不奇怪，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最终也推翻了这两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他自己

的权力基础。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相似之处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证明，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远见、个性、经验和知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邓小平显然不愿追随毛泽东的脚步，但邓小平的行为却与毛泽东惊人地相似，因为他们的决策选择受到了派系林立的领导关系结构的类似制约。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得不忍受派系主义——无论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消除派系主义的努力显得多么认真——因为派系主义是中共政治体制中与生俱来的。因此，政治制度确实会产生影响，而政治结果最终是由制度引起的。

然而，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始终无法为其领导层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尽管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以便为自己的东山再起，更重要的是，为彻底背离毛泽东遗产的改革政策提供合法性，但他不能谴责毛泽东，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本上是在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必须是“不彻底的”。然而，邓小平“不彻底改革”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稳定这两个往往自相矛盾的目标，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根本困境。也就是说，他必须依靠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为他的领导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别无选择，只能推行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激进改革政策。问题是，他的改革政策越是成功，就越是破坏了“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为邓小平的领导层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最终也为整个中共政治体系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邓小平的最终困境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派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 1、邓小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点使他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因此，派系斗争

往往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因为控制意识形态制高点对于一个人在派系权力斗争中证明其政策选择的合理性以及攻击对手都至关重要。

2、由于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主要是通过不断与对手妥协来维持的。因此, 尽管派系活动猖獗导致冲突更加频繁, 但斗争的规模较小, 肃反的残酷程度较低, 对领导层的稳定性和政策制定造成的损害也较小。

3、政策的不一致和领导关系的变化, 与其说是邓小平的胜利或失败造成的, 不如说是他在无休止的派系争权中与对手妥协造成的。

4、由于无法在党内获得绝对的指挥权, 邓小平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队的支持。军队在政治中作用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党性”, 却助长了“派性”。

与毛泽东时期相比, 邓小平时期的所有这些变化导致领导层关系相对更加稳定, 尽管派系斗争频繁, 但决策也更加一致。例如, 1989年5月的危机确实令人震惊, 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下。但这与其说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事件, 不如说是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虽然赵紫阳在邓小平与强硬派的妥协中成为牺牲品, 但政策结果却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 领导层的关系也一直稳定至今。

因此, 正如我在第8章中总结的那样, 我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证实传统观点, 即派系主义会破坏政治稳定, 从而阻碍中国的政治发展。相反, 我的研究表明, 当一个政治派别在决策中取得霸权地位后, 稳定就变得最脆弱。诚然, 派系政治可能是不稳定的, 也可能是混乱的, 但建立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并不能保证政治稳定, 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正式政治程序也不会带来理想的政策一致性。

我在本书中始终论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主导型领导人的权威是建立在派系

争夺权力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忠诚基础之上的，这与他领导下的正式程序不相容，无法保证制度的稳定。首先，他基于忠诚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而正式程序却对所有领导者个人的决策施加了无差别的限制。其次，正式程序将根据每位领导者在决策结构中的地位来重塑领导关系，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忠诚度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领导者的权威。这一切构成了领导关系不稳定和领导决策不一致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当占主导地位的领导者面临可信的挑战，或感到自己受到挑战时，他就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即使这种挑战可能反映了合理的政策争议。结果，本来可以通过正式程序解决的政策争议，总是演变成一场无情的权力对决，弱者被清除，但根本问题——主导领导者的权威与正式程序之间的不相容——仍未得到解决。20世纪50年代初，刘少奇的山头在中央政策制定过程中取得了主导权；在文革集团的动荡年代，一个又一个山头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取得了政策制定的主导权；1976-1977年，“两个凡是派”（whatever faction）自信完全控制了局势；1984-1989年，邓小平的势力几乎完全掌握了政策制定的主导权。然而，我们观察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在第一线管理政策进程的党内官僚的制衡，政治局势最为稳定，政策也最为一致；而在邓小平时期，1989年危机之后，政治稳定与经济稳定增长得以保持，这一点令人惊讶，但意义重大。

正是由于缺乏霸权，妥协才成为可能。派系政治看似不稳定，并可能造成混乱。但是，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不稳定并不是由派系多元化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独裁统治的不妥协性质造成的。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不能容忍政策制定中的任何分歧，另一方面是其他派别为促进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才是导致不稳定和政策不一致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没有任何一个派别能够主导政治进

程的情况下，如 1989 年危机以来所发生的情况，高层领导人就必须不断寻求妥协，而不是在政治斗争中策划政治清洗。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 年以来中国政治局势缓慢但稳步的改善，并不是因为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再次占据了上风。相反，正是由于任何一个派别都无法主导政策进程，才迫使精英成员以更温和、更宽容的方式解决分歧。

作为党内纷争的重要根源，派别纷争不断破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这种趋势在过去二十年中日益明显。随着快速但不平衡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大的多元化，不同派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政策制定上的分歧已成为日常现实。但一方面是对不稳定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各山头之间日益均衡的权力分配，迫使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妥协，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地斗争”。因此，一党专政的不妥协性质已经逐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不断寻求尽可能多的支持以达成最佳交易的过程中，各山头实际上可以代表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利益，从而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这一切都表明，从长远来看，派别纷争实际上可能会促进朝着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制度迈进。